



先秦都城城郭形态的出现及演进*

徐昭峰 王凯凯

摘要:城郭问题应该说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研究表明,先秦时期我国城郭形态的出现与演进存在一定的规律。龙山文化时期是城郭形态的萌芽期,古国时代城郭的出现具有国家产生的标识意味。夏商西周时期都城形态的主流是内城外郭,内城外郭的都城形态并不多见,可视为城郭形态的发展期,该阶段内城外郭成为主流意味着国家机器的强化。东周时期的都城基本上都是城郭具备的城邑形态,可视为城郭形态的定型期,东周时期城郭具备意味着国家机器的进一步强化。这种城郭具备的形态也是从秦汉开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在都城营建中更加注重和不断强化的。

关键词:都城;城郭形态;文明演进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5)03-0015-09

城郭问题应该说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关于城郭,还涉及城郭的问题,笔者在相关文章中进行过论述^①。关于城郭,《吴越春秋》曰:“(鯀)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1]《释名·释宫室》云:“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2]《管子·度地》载:“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阨。”^[3]¹⁰⁵¹一般而言,外侧的大城为郭,是城内居民居住生活的地方;内侧的小城称之为城,即宫城,是国君居住生活的地方。这里需要说明宫城和宫城区的区别,都城内存在的规划有序的宫殿建筑基址区域,可称之为宫城;而在都城宫城区之外还存在墙垣或环壕等防御体系的区域,才能称之为宫城。关于郭与郭的关系,《说文》曰:“郭,郭也。从邑,孚声。”^[4]《春秋公羊传·文公十五年》载:“郭者何?恢郭也。”^[5]恢,大也,恢郭是指面积很大的郭。《韩非子·难二》有“赵简子围卫之郭郭”^[6]之语,张衡《西京赋》中也有

“经城洫,营郭郭”^[7]的语句。从这些相关文献记载来看,郭应在郭外。杨宽认为《逸周书·作雒解》中“郭方七百里”的“郭”并非指城郭,而是周围的自然山川^②。笔者认为这一认识很有见地,根据相关论述,郭应指的是郭城外(若无郭城则为宫城外)依靠周围自然山川构建的具有一定防御功能的设施。

城郭形态的演进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的发展密不可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城郭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其形态又是怎样演进的?笔者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史前时期特大型城址城郭的出现

中国的城址起源可上溯至距今约6000年的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③,此后城址在全国开始广泛出现。仰韶时代晚期,开始出现内外两重城垣的城址,内蒙古准格尔旗小沙湾和寨子塔遗

收稿日期:2024-11-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考古新发现视域下的先秦都城变迁与制度演进”(20BKJ010)。

作者简介:徐昭峰,男,辽宁师范大学副校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连 116029),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及先秦史研究;王凯凯,男,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郑州 450001)。

址发现有内外两重城垣,是两道平行的石墙。但两道石墙的间距往往过小,小沙湾遗址两道石墙间距仅35米,寨子塔遗址两道石墙间距仅15—25米^④,考虑到狭小的空间无法安置太多民居,这种修建两道石墙的目的主要还是加强防御,并无城郭的意义。

龙山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城邑建设的高峰期,各地发现的龙山城址有近百处,但是只有具有内外两重防御设施的城址才可能具有城郭的性质。龙山时代具有内外两重城垣的城址,一部分类似小沙湾和寨子塔遗址的性质,也有一部分具有了城郭的性质。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位于陶寺遗址中心地带,早年材料认为,城址存在早期小城和中期大城两个阶段^⑤。有学者据此认为,陶寺城址的宫殿区外围虽然没有发现规整的宫城城垣,但从其相对封闭的布局形态来看,可能已经有了宫城的性质^⑥。而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所谓的小城其实并不存在,但在原小城范围内发现有宫城,宫城内发现有大型夯土建筑和城门。陶寺城址宫城始建于陶寺文化早期,中期继续使用,晚期经历了重建,到晚期偏晚阶段彻底废弃。陶寺宫城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宫城,其使用年代贯穿整个陶寺文化,这也证明它一直是陶寺遗址的核心。到陶寺文化中期大城修建后,完备的城郭之制也随之形成^⑦。江苏连云港藤花落龙山古城由内城垣、外城垣两道城垣和外城壕组成。外城平面呈圆角长方形,面积约14万平方米。内城平面亦呈圆角长方形,面积约4万平方米,城内分布有两个台基,其上发现有大型建筑。有学者指出藤花落龙山古城内城是中国古代早期宫城的范例^⑧。发掘资料显示,内外城垣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共存的,因此藤花落龙山古城应属于内城外郭的城邑形态^⑨。陕西榆林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组成,城内面积超400万平方米^⑩。其中“皇城台”位于城址西部的中心区域,四周均被石砌护墙包围,东侧偏南位置有一规模庞大的门址,台顶发现一处大型高台建筑基址,其上分布有房址、石砌院墙、“池苑”等遗迹。“皇城台”没有城垣和环壕,但其高台地形以及石砌护墙发挥着同样的作用。结合其独立的空間、高等级建筑的分布来

看,“皇城台”具备了宫城的性质^⑪。内城依山势修建,呈东北—西南走向,将“皇城台”包围。有学者指出,石峁遗址早期修建了“皇城台”和内城,其后才修建了外城^⑫。这表明石峁文化早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城郭之制。浙江杭州良渚古城由莫角山宫殿区和外城组成。其中外城城墙略呈圆角长方形,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墙宽20—145米;位于城内中心地带的莫角山遗址是古城的宫殿区,东西长约630米、南北宽约450米,总面积近30万平方米,是一处人工堆积的高台遗址,其上发现有大量沙泥夯筑层和建筑遗迹^⑬。在莫角山遗址的东、北、南三面各发现一条人工河道,莫角山南侧发现有大型蓄水池和水面,莫角山西侧与姜家山之间有一条河沟^⑭。莫角山遗址人工堆筑的高台本身就具有防御功能,四周又环以水系,具有了宫城的性质,并同外城构成了内城外郭的城邑形态。

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晚期,沿用至石家河文化时期。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形,由双重城垣及城壕组成,总面积约348.5万平方米。城内谭家岭遗址发现有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建筑遗迹,在居住区中心分布有大型房屋,这一区域可能就是城址的宫殿区^⑮。宫殿区外围无城垣或环壕,因此石家河城址并非内城外郭的城邑形态。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发现有一座大城和东西两座小城。东城由于河流侵袭,目前只余西南城角部分。西城平面呈方形,边长90多米,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大城年代晚于小城,修建时两座小城已经废弃。大城位于遗址中部,除北墙和北城壕外,其余城墙城壕无存,北墙残长350米,北城壕长约620米。据已有条件推算,大城面积约为34.8万平方米。大城与小城年代上不共存,因此王城岗城址并非内城外郭的形态^⑯。

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有的形成了典型的城郭形态,如陶寺城址、藤花落城址;有的具备了宫城的性质,但形态有所差异,可称为非典型的城郭形态,如石峁城址和良渚城址;有的仅是具有相对封闭和独立存在形态的宫殿区,如石家河城址。说明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城市发展过程中城郭形态的萌芽时期。

二、夏商西周时期都城城郭形态的演进

发现于河南新密新砦遗址的新砦期遗存被认为是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且与二里头文化更加接近。在新砦遗址发现的新砦期城址平面呈方形,有外壕、城垣与城壕、内壕三重防御设施,城址中心区分布有大型建筑,城址总面积逾100万平方米^①。有学者认为,新砦城址应为夏启之居或启都夏邑^②。新砦城址以浅穴式大型建筑基址为中心的宫城以内壕作为防御设施,内壕以外是城墙和城壕,再外是外壕,该城具有城郭的意义。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是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都邑性城址,一般认为是夏朝都邑斟寻。古本《竹书纪年》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8]二里头遗址目前已发现宫城、大型夯土建筑群、手工业作坊、祭祀遗址、贵族及平民居住区、墓葬区等。二里头文化一期为聚落形成期,面积已经超过100万平方米;二期时出现宫城,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开始走向繁盛;三期是都邑的繁荣期;到四期末废弃。最新的考古发现显示,在位于二里头遗址北侧的洛河北岸的古城村遗址,新近发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3条壕沟和1道夯土墙。其中壕沟2、3及夯土墙大致平行,且与二里头遗址主干道、墙垣、夯土建筑等主体遗存的方向一致,在东、北方向对二里头遗址形成围合之势,推测这很可能是二里头都邑外围的壕沟和城墙^③。如是,二里头夏都也应是内城外郭的形态。

二里冈早商文化的都邑有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二者共存于早商时期。从城址规模、出土遗物数量及规格来看,偃师商城都远逊色于郑州商城,因此郑州商城为早商王朝主都,偃师商城是辅都^④或军事色彩浓厚且具有仓储转运功能的次级中心^⑤。郑州商城由内城和外城组成,面积约2500万平方米。其中内城平面近长方形,城垣周长近7000米,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在东城墙外侧还发现有城壕。外城发现

西、西南、东南、南段城垣,已探明长度达5000米,大致呈圆形^⑥。偃师商城由宫城、小城和大城组成,宫城位于小城中南部,面积约4万平方米,年代最早;小城位于大城中南部,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80万平方米;大城平面呈北宽南窄的“刀把形”,总面积约190万平方米^⑦。郑州商城及偃师商城的宫城和郭城并非同时修建,郭城均晚于宫城,因此这两座城址的形态应该是由内城外郭演变为内城外郭的。

目前发现的中商时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包括郑州小双桥城址和安阳洹北商城。小双桥遗址发现后,对其性质有不同认识,陈旭力证小双桥遗址为傲都^⑧。小双桥城址发现有宫城,位于遗址东北部,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10万平方米。在宫城内发现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祭祀坑、青铜冶铸遗迹及城墙。城墙破坏严重,仅发现宫城北墙的西段和西墙的北段^⑨。宫城外广布丰富的商代白家庄期遗存,但未发现环壕,因此小双桥城址可能是内城外郭的城市形态。洹北商城发现于20世纪90年代末,对其性质也有诸多探讨,目前较为流行的两种说法是“河亶甲居相”及“盘庚首迁于殷”,其为中商时期都邑的性质毋庸置疑。洹北商城由宫城及郭城组成。郭城平面呈规整的方形,东西长约2150米,南北长约2200米,总面积约470万平方米。宫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795米,东西宽约515米。在宫城内发现有夯土建筑基址,包括已经发掘的1号及2号建筑基址^⑩。洹北商城在中商二期早段修建了宫殿区和部分居民区;中商二期晚段到中商三期时,兴建了宫城城墙及其外的防御设施;到中商三期晚段,由于防御或防洪的需要,欲以城垣代替环壕,但一场毁灭性的火灾打断了原计划,宫殿区被焚烧殆尽,都城被迫迁往小屯一带,内城外郭的布局未能形成^⑪。因此,洹北商城是从早期的“宫殿区+郭区”演变为内城外壕,最后意欲营建为内城外郭的都邑形态。

晚商的都城为安阳殷墟遗址。殷墟遗址的发展也是动态的,殷墟文化第一、二期是都邑的形成期,在小屯一带建立了宫庙建筑,外围分布着若干族邑、手工业作坊及墓葬区,在西

北冈营建王陵区。至迟在第二期,在宫庙区西、南两侧开挖壕沟,南北长约1050米,东西长约650米,同北侧、东侧的洹河相连,形成了宫庙区的环壕设施,宫庙区因此具有了宫城的性质。到殷墟三、四期,都城总体布局更加完善,聚落范围不断扩大,东西长6000米,南北宽5000米,总面积近3000万平方米^②。殷墟的都邑形态基本上也是从“宫殿区+郭区”演变为内城外郭。

西周时期的都邑有西安丰镐遗址、宝鸡周原遗址及洛邑成周遗址^③。丰镐遗址位于西安市西南的沔河两岸,分为丰京、镐京两个遗址。丰京遗址位于沔河西岸,东界至沔河西滩地,西界至原灵沼河,北界西自原灵沼河东岸起,沿嵎坞岭北缘与沔河相接,遗址总面积约862万平方米^④。丰京遗址营建于周文王时期,在客省庄、马王村、张家坡一带发现有先周时期遗存及西周时期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这一区域应是文王所迁之丰。2014年,发现一条从曹寨南到大原村西的古河道,全长约2600米,总体为东南—西北走向,连接沔河与灵沼河。发掘者认为,该河道修建时间可能为先周时期,同丰京西、北、东方向的水系共同构成了一个四面环水的、封闭性的环境^⑤。据丰京遗址内先周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来看,周文王所建的丰京宫城很可能就在这一四面环水的区域之内^⑥。镐京营建于武王时期。镐京遗址西界在马营寨西、新庄、张旺渠一线,北界在张旺渠村以东,经官庄、下泉至落水村一线,为原沔河滩地,东界和南界大体与昆明池西界北段重合。遗址总面积约920万平方米。在镐京发现有宫城城壕的线索,1986年在西北距镐京五号宫殿建筑基址600米的位置发现了一条壕沟,面宽9米,剖面为锅底形,稍呈南高北低,底宽6.3米,深3.5—4米。从出土遗物来看,该壕沟修建于西周初年,至迟在西周晚期或以后废弃^⑦。该壕沟很有可能就是镐京宫城的防御设施。综上,丰镐遗址应为内城外郭的都邑形态。

洛邑成周遗址包括灋河两岸的西周早中期成周城和汉魏洛阳故城内的西周晚期成周城(笔者称之为狄泉成周城)。西周早中期成周城在今洛阳市灋河两岸,到西周晚期,由于水

患、防御功能差等原因被废弃,周人在今汉魏洛阳故城一带建起一座新的成周城,即东周时期的成周所在^⑧。西周早中期的成周城横跨灋河,西至史家沟、东至塔湾、北至北窑、南至洛河北岸,东西长约3000米,南北宽约2000米。在这一区域范围内,发现有北窑铸铜作坊遗址^⑨、北窑贵族墓地、祭祀遗址及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⑩。成周有监控殷遗民的功能,一般认为不仅周公治成周,成王也常居于成周,为周王安全起见,成周应该是会设置宫城的。此外,夏商周三代都城均设有宫城,成周也应该会循此传统。从成周城遗存分布情况来看,灋河西南部一带的老城发现有大型宫殿建筑基址,该区域有可能便是其宫城区。成周城外并未发现郭城城垣,若此,灋河成周城也应是内城外郭的都邑形态。西周中晚期,灋河两岸的成周城由于诸多原因逐渐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汉魏洛阳故城一带的狄泉成周城。该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500—2650米,南北宽约1800—1900米,总面积约480万平方米^⑪。在该城址范围内发现了一批西周墓葬^⑫。该城址形态目前还不甚清楚,考虑到汉魏洛阳故城一带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西周晚期周王朝面临的巨大外部压力,笔者以为营建狄泉成周城主要出于军事目的^⑬。若此,狄泉成周城除城垣外,其都城形态应该还是继承了西周早中期的灋河成周城,理应也有宫城,故应为内城外郭的都邑形态。

周原遗址是古公亶父所迁之“周”,是周人兴起之地。近年来,在周原遗址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城址。城址分为宫城、小城、大城,宫城位于遗址西北部,小城中北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794米,南北宽609米,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宫城城垣外有与墙体平行的道路,道路外有宽达21米、深约6米的壕沟。宫城范围内分布有以往发现的凤雏建筑群,经钻探还发现有密集的宫室建筑。小城位于大城的西北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480米,南北宽约1065米,总面积约175万平方米,城址北、东、南三面有人工城壕,西面则以王家沟为壕。小城范围内发现有一般性居址、墓地、手工业作坊,是先周晚期至西周早期遗存分布最集中的区域。大

城位于小城东南,平面呈规整的长方形,东西长约2700米,南北宽约1800米,总面积约520万平方米。大城范围内主要分布有西周中晚期遗存。从城址年代来看,宫城及小城建于商周之际,大城建于西周晚期^⑧。宫城与小城共同组成了西周早期城址,西周晚期由于聚落面积的增大,又修筑了大城。因此,周原遗址的都邑形态应为内城外郭。

三、东周时期都城城郭形态的强化

洛阳东周王城位于涧河两岸,东城墙在今光华路、体育场路一线,总长约3500米^⑨;北城墙位于今纱厂西路一线,全长约2890米^⑩;西城墙不甚规则,全长3000余米;南城墙残长900米,全长估计有3400米^⑪。城址周长约15千米,与晋《元康地道记》所说王城去洛河四十里“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为地三百顷一十二亩有三十六步”^[9]的记载基本吻合。原发掘报告认定城址年代为春秋时期,笔者认为其始筑年代应该为战国早中期,战国中晚期有所增补。东周王城的宫城位于瞿家屯一带,始建年代稍早,为春秋时期。宫城西墙位于涧河故道东侧、东周早期下层建筑基址西侧,与涧河故道走向一致。北墙位于今行署路南侧一带,东墙受古河道冲刷破坏不见,南墙推测和郭城南墙重合或在洛河北岸。战国时期宫城范围缩小,其西半部有夯土城墙、壕沟和河道构成的独立城圈^⑫。因此,东周王城是从内城外郭向内城外郭发展的。

春秋时期,周敬王因王子朝之乱,被迫从王城迁徙至成周城,此后东周成周城成为王朝的实际都邑。在今汉魏洛阳故城发现有春秋晚期扩建及修筑的夯土城墙,应为东周成周城增筑的城垣。《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寻盟,令城成周。”^[10]此外,在洛阳金村还发现有从战国早期延续至战国晚期的大型墓地,其中包括带墓道的大墓,可能是周王及其臣属的葬地^⑬。出于和狄泉成周城同样的考虑,东周成周城应该也存在宫城,其都邑形态也应为内城外郭。

山东临淄齐国故城现存大、小两城。小城

位于大城西南部,部分嵌入大城西南角。小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东西窄,周长7300米,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四周有护城壕。大城位于小城东北部,平面呈长方形,城垣周长14000余米,总面积约1700万平方米。发掘资料表明,大城始建于西周时期,沿用至战国时期,小城年代晚于大城。在大城中、北部发现有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遗存^⑭。刘庆柱认为大城东北部可能有西周时期城址,到春秋时期宫城位于刘家寨北一带,战国时在大城西南兴建了新的宫城,即现存的小城^⑮。因此,临淄齐国故城是城郭具备的都城形态。

陕西宝鸡秦雍城遗址是东周时期秦国的早期都城遗址,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形,东西长3300米、南北宽3200米,总面积约1056万平方米。城内高等级建筑主要分布在马家庄及铁沟、高王寺、姚家岗三个区域,发现了包括马家庄一号建筑、马家庄三号建筑、姚家岗宫殿遗址及姚家岗凌阴遗址在内的宫殿宗庙建筑群^⑯。虽然宫庙区暂未发现城垣,但从城内“市”遗址发现的城墙来看^⑰,宫庙区外应该是有城墙的。若此,秦雍城也应为内城外郭的都邑形态。

湖北荆州楚纪南城为战国时期楚国郢都,平面呈长方形,北、东、南、西城墙分别长3547米、3706米、4502米、3751米,城墙外围绕有城壕。城内东南区发现有61处夯土建筑基址,在该区外围发现东城垣750米及北城垣690米,应是宫城的东垣和北垣,在宫城内勘探出的夯土基址有40座^⑱。楚都纪南城应不是仅有一周郭城城圈,而是典型的内城外郭的都城形态。凤凰山西坡古河道、北垣北的龙桥河、宫城西的新桥河应为宫城外的护城河^⑲。

河南新郑郑韩故城位于双洎河和黄水河交汇处的三角地带,先后为郑、韩两国都城。郑都时期修建了东、西相连的两座城址,城址整体呈不规则形状,两城中部有一道南北向的隔墙。西城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800米,南北宽约2400米。在西城内发现有一高台建筑台基,南北长约135米,东西宽约80米,高约8米,应为宫殿建筑,故西城应为郑都宫城。东城南北长约4400米,东西宽约2800米,在城内中北部一带

发现有铸铜、制陶等手工业作坊,南部发现有春秋时期的郑国贵族墓葬,东城应为郑都郭城^⑧。韩灭郑后,将国都迁于郑都,并在郑都基础上进行改建。在西城中部及北部发现有韩国的宫城和宗庙遗迹,宫城长约500米,宽约320米,平面呈长方形,在宫城偏北发现有夯土建筑基址。西城原郑国高台基建筑之上发现有铸铜作坊遗迹。东城继续沿用,在东城发现有大量战国时期手工业遗存,可见东城仍作为郭城^⑨。郑韩故城应是西城东郭的都邑形态。

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始建于西周时期,沿用至东周。鲁故城郭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3700米,南北宽约2700米,总面积约1000万平方米,东、南城墙外有人工修建的城壕,宽度为40—60米^⑩。外郭城城墙始建于西周晚期,延续至战国晚期。根据新的发掘资料,在曲阜周公庙台地边缘发现有东周时期的墙和壕沟,判断为鲁故城宫城。宫城平面呈长方形,西北角略内折,城内东西长约480米,南北宽220—250米,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城内发现有大量东周时期的建筑遗迹。宫城始建于春秋晚期,战国晚期废弃^⑪。据此,曲阜鲁国故城应为内城外郭的都城形态。

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是战国时燕国的都城,由东、西两座城组成,中部存一南北贯通的古河道,在河道东部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城垣,河道和南北向城垣将城址分成东西两部分。众多遗迹主要集中在东城内。东城近方形,东、西、南、北墙长分别为3980米、4630米、2210米、4594米,东城墙外有护城壕,西城墙外为分割东、西二城的河道。东城内中部偏北有一道东西向的“隔墙”将东城分为南北两部分,“隔墙”北部分布众多的夯土基址,此处应为宫城。东城西南部及东南部分布有居住区,墓葬区分布在城的西北部,东城南部应该是作为郭城的。西城内只发现零星墓葬和居住遗址,整体较为空旷,可能是东城的一个附城^⑫。燕下都应是城郭具备的都城形态。

陕西秦咸阳城遗址南临渭水,因渭水的侵蚀,遗址南部遗迹大多被冲毁,城墙方面,尚未发现郭城,多数是学者们根据调查及文献的推测。但一处西起姬家道沟东到聂家沟东的夯

土墙是值得注意的,墙东西长1048米^⑬。宫殿建筑主要分布在刘家沟、牛羊村和聂家沟以北的塬上及塬边,这一区域有大量的夯土基址,在其周围发现有东西长900余米、南北宽570余米的城墙,应为宫城城墙^⑭。根据文献记载,结合考古材料,秦都咸阳也应是城郭具备的都城形态。

河北赵邯郸故城分为赵王城与大北城两部分。赵王城在故城西南部,分为东城、西城、北城三个相接的小城,呈品字形布局。西城近方形,边长约1400米,城内分布有多处高台建筑。东城与西城共用中间的一道城墙,东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400米,东西宽约935米,城中部分布有高台建筑。北城利用了部分东城和西城城墙,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约1557米,东西宽约1326米,城内发现有夯土台基。从三座小城内分布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及相关高等级遗存来看,赵王城应为宫城。大北城西南部与赵王城东北部相邻,平面为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约4800米,东西宽约3000米,面积约1600万平方米。大北城始建年代早于赵王城,赵在迁都前后对大北城进行了一定改建,作为郭城^⑮。所以,赵都邯郸是城郭分立的都城形态。

河北平山中山国灵寿故城平面呈不规则形,城墙曲折,没有明显的拐角,东西宽约4000米,南北长约4500米,总面积约1800万平方米。中间一道隔墙将城址分为东西二城。东城北墙保存完好,全长约2450米;东墙沿京御河西岸修建,仅余750米;南墙已被河道冲毁无存;西墙为东西二城隔墙,现存约2920米,估计全长约5100米。东城东北部发现有多处夯土建筑基址,应为宫室建筑,西部发现有多门类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南部发现有建筑基址,推测为官署区,东城应为宫城。西城北墙与东城北墙相接,长约1200米,西墙沿护城壕修建,长约4050米,南墙被滹沱河冲毁,估计全长约2350米。西城北部有王陵区,与南部的居民区以陵墙相隔,东部发现有两处建筑基址,北距手工业作坊遗址不远,推测是当时的“市”,西城应为郭城^⑯。因此,中山国灵寿故城也应是东城西郭的都邑形态。

四、都城城郭形态的演进与文明的起源及发展

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出于聚落对外防御敌人、猛兽及洪水的需要而产生的,同时也伴随着文明社会的形成、国家的出现和发展。而宫城和郭城的区分则反映出阶级分化和社会分层,正是文明起源和国家产生的重要体现。

从城址形态来看,史前时期的城最早出现于仰韶时代晚期,以仅有一周郭城的单城垣城址最为常见,少数双城垣城址也是为了强化防御功能,没有宫城的性质。到龙山文化时期,相当数量的特大型城址具备了宫城的所有要素,并与外郭城形成城郭形态,如石峁遗址的“皇城台”和内城,陶寺城址的宫城与大城,藤花落古城的内城与外城,良渚古城的莫角山宫城与外郭城等,其中陶寺城址和良渚城址都具有古国都邑的性质。但还有一部分城址仅具有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宫殿区,如王城岗城址和石家河城址。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城郭制度的萌芽时期。

进入国家阶段后,夏初的新砦城址也具备城郭,这一形态可能是夏初延续龙山时代大型城址具有的城郭形态,也可能是夏初国家刚刚建立时对外战争和冲突尖锐的反映。许宏在《大都无城》一文中提出夏商周时期的都城都应存在宫城^⑧。这一认识的形成也是近几年的事,其中包括近些年对二里头、小双桥、洹北商城等遗址宫城的确认及周原西周宫城和郭城的确认。此外,宗周丰镐、洛邑成周的宫城还没有完全确认。不过,从前文的论述来看,二者都应存在宫城。

以夏商西周时期都城宫城外围有无郭城,可将该时期的都邑形态分为两大类型:其一是内城外郭的都邑形态,包括新密新砦、二里头城址、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洹北商城、周原城址,可能还包括狄泉成周城;其二则是所谓“大都无城”的内城外郭模式^⑨,包括小双桥城址、小屯殷墟、宗周丰镐,可能还有瀍河成周城。从都邑形态的发展来看,原来认为的“夏商西周时期内城

外郭的布局才是都城空间结构的主流”^⑩这一观点可能需要修正,内城外郭的都城形态才应该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新的考古发现不断刷新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内城外郭形态的布局主要出现在晚商和西周早期,而从商周关系来看,西周都城宗周和瀍河成周很可能是受到了殷墟布局的影响。但近来发现的周原城址及西周晚期的狄泉成周城,显示出内城外郭形态仍是这一时期都邑形态的主流。

东周时期的都城基本上都是城郭具备的城邑形态,其中如东周王城、东周成周城、临淄齐国故城、楚都纪南城、曲阜鲁国故城、秦都雍城、咸阳城、易县燕下都等都是内城外郭的都城形态。也有部分城址城郭具备,但并非典型的内城外郭形态,而是城郭东西并立,如郑韩故城、赵都邯郸城和中山国灵寿故城等。

基于上述分析,我国先秦时期城郭形态的基本演进规律可概括如下:

史前龙山文化时期是城郭形态的萌芽期。从古国时代开始,阶级对立导致国家产生,统治者不仅重视外部的军事冲突,同时也开始重视内部矛盾和自身安全,这也是从最早城址仅有一周城圈到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后宫城产生的背景,也是宫城在国家产生之后任何阶段都存在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郭的出现具有国家产生的标志意味。

夏商西周时期的都邑形态以内城外郭为主,其间晚商和西周早期存在一部分内城外郭形态。故这一时期可视为城郭形态的发展期。在夏商西周时期,统治阶层特别重视国家层面防御体系的构建,包括外围防御网络、常备军的设置和扩充、预警和征兵机制等。都城营建内城外郭成为主流意味着国家机器的强化。

东周时期,周王室衰落,诸侯争霸战争频发。与这一历史背景相适应,东周时期的都城基本上都是城郭具备的城邑形态,可视为城郭形态的定型期。东周时期战争冲突的常态化和激烈化,导致统治者尤其注重军事防御,修建的郭城均规模宏大,城高壕宽。《管子·乘马》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3]83}

东周时期的国都营建基本都遵循《管子·乘马》的国都选址原则。东周时期城郭具备意味着国家机器的进一步强化,这种城郭具备的形态也是自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在其都城营建中更加注重和不断强化的。

注释

①徐昭峰:《从城郭到城郭——以东周王城为例的都城城市形态演变观察》,《文物》2017年第11期。②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3年第12期。④李丽娜:《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城邑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61页。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⑥庞小霞、高江涛:《试论中国早期宫城的形成及初步发展》,《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⑦高江涛:《襄汾陶寺遗址宫城及门址考古取得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18年3月9日。⑧李德方:《中国古代宫城出现于龙山时代》,载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21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217页。⑨南京博物院、连云港市博物馆:《藤花落:连云港市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7—438页。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石峁遗址皇城台地点2016~2019年度考古新发现》,《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4期。⑫邵晶:《试论石峁城址的年代及修建过程》,《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⑬刘斌、王宁远:《2006—2013年良渚古城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2014年第2期。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136—182页。⑮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载四川大学博物馆编:《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天门市石家河遗址2014~2016年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7年第7期。⑯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2期;《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浅穴式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考古》2009年第2期。⑱赵春青:《新密新砦城址与夏启之居》,《中原文物》2004年第3期;马世之:《新砦遗址与夏代早期都城》,

《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⑲李韵、王笑妃:《夏商考古迎来重大突破》,《光明日报》2024年12月27日。⑳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7—78页。㉑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谈起》,载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71—134页。㉒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刘彦锋等:《郑州商城布局及外廓城墙走向新探》,《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商城》(第1卷),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页。㉔陈旭:《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即隰都说》,《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1—62页。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中加洹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课题组:《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遗址2005~2007年勘察简报》,《考古》2010年第1期。㉗张国硕:《试析洹北商城之城郭布局——兼谈大城城垣的建造》,《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4期。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页。㉙徐昭峰:《成周城析论》,《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3期。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考古八十年》,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3页。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西安市长安区丰京遗址水系遗存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8年第2期。㉜付仲杨、徐良高:《2014年丰京遗址考古勘探和发掘新收获》,中国考古网,2015年4月24日, https://kaogu.cssn.cn/zwb/cxgc/cxxm/201504/20150424_3933292.shtml。㉝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镐京西周宫室》,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9页。㉞徐昭峰:《成周与王城考略》,《考古》2007年第11期。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窑村西周遗址1974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7期。㊱刘富良:《洛阳市西周夯土基址》,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0》,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㊲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演变初探》,载《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8—439页。㊳陈国梁等:《汉魏洛阳故城两周时期墓葬发掘取得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07年12月5日。㊴周原考古队:《2020—2021年周原遗址西周城址考古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7期。㊵安亚伟:《洛阳市014中心东周及唐代夯土》,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文

物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08—209 页;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周王城东城墙遗址 2004 年度发掘简报》,《文物》2008 年第 8 期。④叶万松、赵振华:《洛阳市东周王城城墙遗迹》,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86 页。⑤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东周王城城墙遗址 2013 年度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5 年第 4 期。⑥徐昭峰:《试论东周王城的城郭布局及其演变》,《考古》2011 年第 5 期;徐昭峰:《试论东周王城的宫城》,《考古与文物》2014 年第 1 期。⑦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9 页。⑧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齐故城》,文物出版社 2013 年版。⑨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97—198 页。⑩陕西省文管会雍城考队:《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 年 2 期。⑪王兆麟、卜云彤:《秦古雍城发现市场和街道遗址》,《人民日报》1986 年 5 月 21 日。⑫⑬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0—58 页。⑭⑮河南省博物馆新郑工作站等:《河南新郑郑韩故城的钻探和试掘》,载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6—66 页。⑯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 1982 年版,第 4 页;韩辉、徐倩倩、高明奎等:《曲阜鲁国故城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确认了鲁故城宫城,解决了宫城、外郭城的年代问题》,《中国文物报》2017 年 3 月 10 日。⑱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65 年第 1 期。⑲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秦都咸阳故城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62 年第 6 期。⑳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科学

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20 页。㉑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赵都邯郸故城调查报告》,载《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㉒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平山三汲古城调查与墓葬发掘》,载《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05 年版。㉓㉔㉕许宏:《大都无城——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态》,《文物》2013 年第 10 期。

参考文献

- [1] 赵晔. 吴越春秋辑校汇考[M]. 周生春, 辑校汇考.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264.
- [2] 刘熙. 释名[M]. 愚若,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78.
- [3] 黎翔凤. 管子校注[M]. 梁运华, 整理.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4] 许慎. 说文解字注[M]. 段玉裁, 注.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5: 500.
- [5] 十三经注疏: 春秋公羊传注疏[M]. 阮元, 校刻.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4938.
- [6]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M]. 钟哲,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367.
- [7] 赵逵夫. 历代赋评注: 汉代卷[M]. 成都: 巴蜀书社, 2010: 593.
- [8] 范祥雍.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6-7.
- [9] 孙诒让. 周礼正义[M]. 王文锦, 陈玉霞,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3424.
- [10] 十三经注疏: 春秋左传正义[M]. 阮元, 校刻.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4619.

A Study on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Capital City in the Pre-Qin Period

Xu Zhaofeng and Wang Kaikai

Abstract: The issue of city is a significant academic topic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apital systems.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this architectural form during China's pre-Qin period followed certain patterns. During the Longshan Culture period, the concept began to take shape, marking its embryonic stage. In the era of ancient states, its appearance symbolized the emergence of statehood. During the Xia, Shang, and Western Zhou periods, the dominant capital layout was characterized by an inner city and an outer city, which was the developmental phase, reflecting the strengthening of state machinery. By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capitals typically adopted the complete form of inner city and outer city, marking its mature phase. This form symbolizes the strengthened state machinery. It also reflects the the lasting focus and further consolidation of state machinery in the centralized imperial era that began with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Key words: capital city; layout of cities; 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知 然]